

20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卷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社会学卷

李培林 孙立平 王铭铭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李培林等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 - 209 - 02674 - 6

I .2... II . 李 ... III . 社会科学 - 科学研究 - 中国 IV .C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221 号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社会学卷

李培林 孙立平 王铭铭 等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4 插页 34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 - 209 - 02674 - 6
C·168 定价：26.00 元

出版说明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迁……需要回顾和总结的东西的确很多。我们编写出版《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目的就是试图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梳理、阐发和总结，希望能为下个世纪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及社会问题提供一套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书从提出选题到最终付梓，历时三年多。其间，召开了两次编写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汪晖、李培林、葛兆光、王守常、汪丁丁、孙立平、朱苏力、李强、贺卫方、高名潞、罗志田、韩毓海、黄平、王名贤等专家学者，以及山东省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两次编写会议就编写出版《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统一了思想和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原定八卷，包括人文科学四卷（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四卷（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成书的只有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和法学五卷。作为策划、组织者，总感到有些遗憾。

参与本书编写的作者都是活跃在当今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能够组织起这样一支“过硬”的作者队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感谢他们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合作，特别是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和

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这也是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的重要条件。

由于一百年来各门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也由于各卷作者的风格不尽一致，所以全书的体例并不强求统一，这反而使得各卷具有了不同的特点和风格。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关心一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读者来说，将是一件颇有助益的事情。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1
J
A
B
A
B
A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化的求索：启蒙、进化与改良 …… 李培林 (1)

第一节 启蒙与西学东渐：社会学的产生…………… (1)

一、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 (1)

二、群学与社会学…………… (9)

第二节 社会进化：天演、变法、保群 …… (18)

一、天演人变：寻求社会进化的规律 …… (18)

二、群学：内圣外王和群本主义 …… (25)

第三节 现代化：改良与制度变迁 …… (32)

一、社会学改良思想与学术的制度化 …… (32)

二、学术走向生活及其反思 …… (45)

第二章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皇权

…………… 郭金华 林海 孙立平 (59)

第一节 皇权与专制制度 …… (60)

一、皇权与分封制 …… (60)

二、关于皇权研究的几点结论 …… (68)

第二节 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 …… (70)

一、皇权制度的根源 …… (70)

二、传统文化中的皇权观念 …… (72)

第三节 皇权与绅权 …… (77)

一、皇权的边界	(77)
二、士绅理论的视角	(79)
第四节 皇权、绅权和地方精英	(84)
一、从士绅研究到地方精英研究的过渡	(84)
二、地方精英理论的视角	(86)
第五节 进一步的思考	(86)

第三章 乡土社会及其社会结构特征

..... 刘建华 孙立平	(95)
第一节 乡土社会	(95)
一、“乡土性”的基本含义	(95)
二、乡土社会的“礼治”	(97)
三、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	(100)
第二节 差序格局与家族制度	(102)
一、差序格局的社会圈子	(102)
二、家族制度和文化延续	(106)
第三节 农村社会组织	(112)
一、传统农村的行政组织和家族组织	(112)
二、农村社会组织的改造	(116)
第四节 土地制度	(119)
一、土地制度的变化	(119)
二、平均地权的理想和实践	(121)

第四章 中国农村社会调查

任道远 孙立平 (126)

第一节 农村调查和农村社会	(127)
第二节 数字里描述的农村社会	(131)
一、早期农村调查的兴起	(131)
二、数字化的实证调查：社会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132)
三、农村落后原因的初步探索.....	(138)
第三节 被改造的中国农村.....	(141)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	(141)
二、针对“愚、贫、弱、私”的“新民运动”.....	(143)
三、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农村.....	(145)
第四节 农村土地调查.....	(148)
一、阶级分析的方法.....	(148)
二、中国农村阶级剥削的事实.....	(148)
三、地主的剥削手段.....	(150)
第五节 中国的农村社区.....	(152)
一、社区研究的策略.....	(152)
二、《江村经济》.....	(153)
三、《禄村农田》.....	(156)
第五章 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	李培林 (160)
第一节 乡村工业化问题的提出.....	(160)
一、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160)
二、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166)
三、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170)
四、农村社会的性质的论战与工业化道路.....	(175)
第二节 乡村工业化的不同型式.....	(184)
一、江村经济：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厂工业.....	(184)
二、易村手工业：作坊工业.....	(191)
三、昆厂劳工：进城民工与工厂工业.....	(194)
第三节 改革以来农村工业化模式的研究.....	(200)
一、小城镇和乡村工业的类型.....	(200)
二、乡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203)

三、关于几个乡村工业化的学术探讨性案例·····	(208)
第六章 城市社会生活 ····· 王颖	(222)
第一节 早期城市生活调查·····	(222)
一、20 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运动·····	(223)
二、早期城市生活调查的兴衰·····	(224)
三、早期城市社会学调查与研究·····	(225)
第二节 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及其反思·····	(227)
一、1949 年以前的中国城市·····	(227)
二、1949~1978 年间的城市化道路反思·····	(229)
三、1979 年以后的城镇发展·····	(232)
四、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之路·····	(235)
第三节 城市化模式与城市化水平·····	(239)
一、关于城市化模式的讨论·····	(239)
二、滞后城市化与隐性城市化·····	(253)
三、城市化水平的测算·····	(256)
第四节 市民自治、社区建设与城市管理·····	(260)
一、市民自主意识与市民自治组织·····	(261)
二、重建城市社区·····	(262)
三、城市管理体制的变革·····	(267)
第七章 人口与生育制度研究 ····· 郭志刚 陈功	(273)
第一节 建国前的人口研究状况·····	(275)
一、三个阶段的人口研究·····	(275)
二、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	(279)
三、关于生育节制的两次论战·····	(281)
四、建国前人口研究的观点·····	(284)
五、调查活动与学术机构·····	(293)

第二节 建国后的人口研究状况·····	(304)
一、建国后人口问题的研究和争论·····	(304)
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批判·····	(310)
三、人口调查统计与人口研究活动·····	(315)
第三节 恢复和迅速发展时期的人口研究·····	(318)
一、人口研究的新发展·····	(318)
二、若干重点问题的争论·····	(326)
三、人口调查研究与学科建设·····	(335)
第八章 人类学在 20 世纪中国····· 王铭铭	(350)
第一节 引言：人类学在中国·····	(350)
第二节 一门西学：从古典人类学到社会人类学·····	(352)
一、西方人类学与西方启蒙·····	(352)
二、启蒙人性论的反思·····	(358)
三、社会人类学的世界观·····	(369)
第三节 汉语人类学：西学“本土化”的前期·····	(385)
一、人类学与中国启蒙·····	(385)
二、人类学与民族—国家·····	(391)
三、国家与学科·····	(400)
第四节 汉语人类学：革命后的改造·····	(415)
一、分化的过程·····	(415)
二、改革以来的人类学·····	(429)
第五节 历史的困境·····	(444)
后记·····	(459)

第一章

现代化的求索：启 蒙、进化与改良

李培林

第一节 启蒙与西学东渐：社会学的产生

一、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

在西方，社会学的产生一般从法国的孔德算起，学术界中多数人都认为他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因为他为了区别于已被“庸俗的”社会统计学家“剽窃”了的“社会物理学”概念，首先创造了 Sociology（社会学）这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混合词，并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出版的 6 卷本《实证哲学教程》的第 4、5、6 卷中（特别是第 4 卷中），首先提出了社会学这门新学科的观点。但孔德的思想在西方一般仍被归于社会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在他那里，社会学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哲学的母体，社会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还没有获得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专门性。社会学的学科化一般从法国的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算起，因为他于 19 世纪末首先在大学里开设社会学课程，在 1895 年发表了《社会学方法论》，并随后创办了《社会学年鉴》。他使社会学在正式教育体系中确立了独立的学

科化地位，成为脱离哲学母体的独立学科。关于这段社会学初始和学科化历史的解说，虽然也有一些笔墨官司和思想姻缘的公案^①，但基本上是白纸黑字摆在那儿，提不出太多的异议。

但在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就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要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把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区别开来。学术思想的学科化应当说是一种近现代的现象，是学术研究中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结果。古代和古典时代的先贤圣哲，基本上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学贯古今，知通百科，堪称思想大师。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专门化一些，更加偏重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但他们绝非今天我们所说的专家。这个现象，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在西方被许多学科尊崇为开山鼻祖，他不但著有《形而上学》、《物理学》等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还著有《伦理学》和《政治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中包含的思想涉及到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等，他也就因此而被许多学科奉为创始人或奠基人。把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并把所有的知识融入一个统一的体系，这可能是西方近现代以前所有学者的共同特点和意识，起码是近现代以前那些堪称思想大家的学者的共同特点和毕生追求。

西方直到 18 世纪，学术研究的学科化过程仍未完成。伏

① 如法国已故的现代著名社会学家阿隆 (Raymond Aron)，就极力地扬孟抑孔，认为孟德斯鸠是先于孔德的社会学理论家，而不仅仅是思想先驱；孟德斯鸠的理论解释比孔德更具有新意，孔德的学说不过是简单化了的决定论哲学，所以阿隆的社会学理论教程是从孟德斯鸠讲起，而不像一般人那样从孔德讲起。见 Aron, R. (1967), *Les E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Gallimard, 1967. 中文版：雷蒙·阿隆 (1988)，《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一大批学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思想家，但却很难称他们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等，因为他们的思想尚未经过专门的学科化，知识在他们那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可以解释一切的整体。如孟德斯鸠并没有因为写了《法的精神》（旧译《法意》）就成为专门的法学家，他在法国更经常被称为文学家、政治理论家或法律史家。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法文版序言中，甚至说“孟德斯鸠是法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只有亚当·斯密才能与其相比拟”（Keynes, 1953: 13）。也不知是真心认为孟德斯鸠富有开创性的经济思想，还是讽刺法国缺乏经济学的思想大师。以英国的绅士作派来看，更像是前者。每天下午正点喝红茶的英国学者，不会潇洒到在自己书的外文版发行时开这种国际玩笑，但穿着牛仔裤就上大学讲台的法国教授们，对这种来自英国的赞誉之词却并不以为然，反认为这是一段“颇有争议的俏皮话”。西方启蒙思想家实际上是从摧毁知识的旧体系，特别是形而上学体系发端的。他们那时认为，对宏大体系的刻意追求（*esprit de système*）已经不再是理性的动力，反而成为理性的障碍和制约。但事实上，启蒙思想家所激烈抨击的知识构造的传统，是从不证自明的定理出发，演绎出一成不变的知识体系的做法，他们自己却以归纳的自由精神创造着他们所追求的新的知识体系。在他们中间，我们也许无法像我们习惯的那样，发现像西方 17 世纪学术思想从笛卡尔到马勒伯朗士，从斯宾诺莎到莱布尼茨，从培根和霍布斯到洛克的清晰发展线索，但他们共同具有的建立新的百科全书知识体系的系统精神（*esprit systématique*），却是理解他们的学术追求和思想取向的钥匙（卡西勒，1932/1988：序、1-35）。换句话说，西方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完成的是思想认识论或知识观念论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完成知识

的学科化和专门化的过程。套用库恩关于科学群体的观念“范式”（Paradigm）的说法，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尚未进行观念“范式转换”的“历史的局限”。

在思想大师们的知识体系具有包罗万象、浑然一体的特点的时代，社会思想是每一位思想大师必然具有的、而且不可能不具有的思想。只不过在古典时代，思想家达到大师的地步，不像现在有诺贝尔奖或者其他什么国际大奖这种既荣耀又实惠的名号，所以那时若不是被赐一个什么等级的爵位，就只能是赐一顶哲学家的桂冠。而在哲学家那里，社会思想往往被视为其哲学思想的婢女、陪衬、延伸和尾缀，教科书或思想家评传中，也往往是先评介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然后来个关于伦理、教育、历史等社会思想的尾巴。所以，写社会思想史，人们必然追溯到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大师那儿。而写社会学思想史，只能从孔德写起，就像写经济学思想史只能从亚当·斯密写起一样，顶多加上点在此之前的“思想先驱”之类，而不能不管什么学科都去抱亚里士多德的佛脚。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化的知识体系是不同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每一门知识完成其学科化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大概哲学是最早完成其学科化的，经济学的学科化大概比社会学的学科化早了一代人的时间，亚当·斯密已经著作等身、寿终正寝之时，孔德才刚断文识字，而政治学的学科化还要晚很长时间。

中国的社会思想也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诸子百家，但中国的社会学思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中国的社会学又是什么时候完成学科化的呢？谁是中国的孔德？谁是中国的迪尔凯姆呢？如果没有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和撞击，中国学术思想的学科化过程是否仍会按照它实际经过的轨迹？换句话说，中国古典知识体系过度人文化的底蕴，能否使现代学科化意识的产生成为一种中国知识体系自身的自然发展的过

程？凡事都要有个标准，有个说法，有个尺度，什么是现代的学科化意识呢？这种学科化意识显然不是创造个新名词、杜撰个新概念或提出个前无古人的什么“学”来那么简单。法国著名的现代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这位更经常被国内学人尊崇为具有解构意识的“后现代”大师，曾在他的方法论奠基之作《词与物》中，把西方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知识结构变迁划分成三个阶段：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相似原则”上的，17、18世纪古典时代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有序原则”上的，而19世纪现代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因果律原则”上的，追寻最终根源的因果律，探索现象背后的统一的普遍规律，是现代知识体系共同的主题（Foucault, 1966）。并非所有的现代人都具有现代的意识，也并非现代的意识仅仅产生于现代。从把上帝作为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到追求各个具体领域中具有解释力的普遍法则，这是跨时代的学术意识的过渡，但这种过渡和学科化意识的形成经历了几个世纪和数代人的时间。牛顿寻求物理学领域中上帝的第一推动力，寻求解释从苹果落地到行星运行的万事万物的“万有引力”定律；布封寻求植物学领域中普遍法则，寻求解释植物的物种分类和物种生成转换的“有机分子”定律；亚当·斯密寻求经济学中财富的奥秘，寻求引导人们从私利本性出发走到公益的未预期结果的“看不见的手”；孔德则寻求人类社会像其他领域一样起支配作用的不变的法则，寻求社会历史根据“秩序”和“进步”的法则从神学阶段（军事时期）到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再到实证科学阶段（工业时期）的根本发展规律。

中国古典时期并不缺乏对解释万事万物的统一因果律的寻求精神，阴阳五行学说就是这种寻求的结果。但这种学说过早地精致化，以至成为泯灭其他思想创见的具有至高无上意义的统制学说。而且，这种与浑然一体的知识体系相适应的体系精

神，在长期的自身发展中，再也没有完成时代门槛的跨越，没有演变和转型为对具体学科领域中统一因果律的寻求。各个具体的学科领域，无论是哲学、炼金术还是医学和化学，仍然习惯于沿用阴阳五行的统一假说来解释专门领域中的具体现象和技术，所以中国可以在 1578 年就出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很早就有细致的、完整的动植物分类学，可以在 1637 年就出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很早就有各种生产技术和制造方法的分类，但由于缺乏对具体学科领域中自身的统一因果律的寻求，所以从《本草纲目》中没有发展出分子生物学，从《天工开物》中也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物理学和化学。同样中国从自身发达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史学思想中也难以产生社会学。对具体学科领域统一因果律的寻求是一种现代的学科化意识的萌生，这种意识在中国的萌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所以说，中国历史上有博大精深、系统完整且智慧璀璨的社会思想，但社会学和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出现却是西学东渐、文化融合的产物。

为什么说中国社会学思想的产生，除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也同时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呢？这是因为，中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走向实证的启蒙思潮，恰恰与社会学的实证特点合拍了。孔德在阐述社会学的实证特点时就曾指出，实证的精神就是用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取代虚妄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东西，用对现象的不变规律的研究取代从所谓的第一原因出发的解释，而且他还自傲地宣布，从他开始，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才真正成为实证的科学。梁启超在他 1923 年演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中国学术开始走向务实的思潮追溯得更远。他认为近 300 年的学术思潮是对过去 600 年的道学传统的反动，“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

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出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义”（梁启超，1985版：91）。这也并非梁启超一人的看法，蒋方震在1921年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写的序中说：“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又说：“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而一方则谈玄之风犹未变。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①这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潮上的走向实证的精神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上的实用风气。许多学者在概括16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学术思潮时，都称之为“经世致用思潮”或“明清实学思潮”（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1989）。

当然，这种西学东渐和知识交融的过程，绝非是充满诗意和浪漫气氛的文化旅游，而毋宁说是在被动的强权和屈辱之下自觉的发愤自强之举。关于这个过程，林林总总的史书上有各种分析，而梁启超的描述可能更接近他们那一代人和他们那一派人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实际过程：

^①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原是应蒋方震之邀为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写的序言，但“下笔不能自休”，一写就是洋洋数万言，几乎与原书差不多了，结果只好单独成书，并反邀蒋方震为之作序（梁启超，1985版：89~90）。